



蔣慰堂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

昌彼得

蔣復璁先生字慰堂，生於清光緒年間，民國七十九年九月逝世。蔣先生是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創辦人，並負責央館館務三十餘年。本文為紀念蔣先生對圖書館事業的貢獻，由中國圖書館學會邀請昌彼得先生執筆之懷念文字。

民國五十二年，慰堂先生服務中央圖書館三十周年，教育部黃季陸部長特授予金質獎章，以酬庸其勳勞，並頒發獎辭，有云：「自籌備以至成立，重歷播遷，而底恢復，其主持擘畫雖如一日，而締造經營者，不啻四數。」中央圖書館的誕生與成長，正遭逢時代的大動亂，幾經播遷，其歷程的艱辛，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然而慰堂先生並未因挫折而氣餒，奮鬥不懈，毅力至是令人欽敬。二十一年十一月，慰堂先生自德學成歸來二十二年一月，教育部聘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旋改派為籌備處主任，正式展開籌備的工作。

中央圖書館的創建不像國立北平圖書館有京師圖書館的前身，又撥藏了一套熱河行宮所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善本收藏有基礎，而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在有限的經費與工作人員之下，逐年累積得來的成果。慰堂先生認為，一所國家圖書館主要的採訪任務有三：（一）集藏全國文獻，（二）搜羅世界的名著，（三）典藏本國的珍籍善本。他集藏全國文獻的方法有二，首先開始徵集「官書」，即政府的出版品，如各部的公報等。徵集官書雖是惠而不費，但需要持之有恆，此類官書如不及時徵集，時間一久，補齊就困難了。公報等官書，在當時似乎並不受人重視，而若干年後，就是很有價值的文獻。他的第二個步驟是建議修訂《出版法》。本來的《出版法》雖規定出版商出版的書刊須繳交一份予當地政府教育局，但省市教育局是否轉繳中央或出版商有否呈繳，則乏專責單位。民國二十四年，先生代表教育部出席行政院召開的修改《出版法》審查會，建議凡出版商所出書刊，應直接繳送國立中央圖書館一份，否則，可函請內政部予以行政處分，得獲通過。是年七月，《出版法》修正公布，使中央圖書館成為正式的國家機構，集藏全國文獻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無需經費。

欲搜羅世界名著，在籌備之初極少的經費之下，無異是緣木求魚，談何容易。於是先生極力推動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計畫。影印四庫雖是海內外人士所嚮往，但自民國以來幾次的計畫，都未成為事實。經過先生京、滬、北平等地的奔走遊說，雖然當時也有若干學界的人士意圖阻撓，幸賴教育部王雪艇部長鼎力支持，力排眾議，終於在民國二十四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珍本初集》出版，凡一千九百六十冊，內收罕傳之書兩百三十一種。中館籌備處獲得了一百部版權書，拿來與世界各國圖書館進行交換，現今中館所藏的早年出版之西文重要期刊與參考書，除小部分是價購外，絕大部分是用珍本交換所得，且於民國三十八年運來臺灣的。慰堂先生原希望繼續選印，但不久抗戰發生而告作罷。

集藏善本珍籍則是較困難的部分，不僅需要大筆的金錢，還需要機緣，而機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籌備之初，先生奉部派赴北平，將清學部及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所有檔案及圖書搬運到南京，運

來的圖書四萬多冊就撥交中館收藏；前清金陵官書局的藏書及所雕的版片也由部撥交管理，為中館集藏舊籍的基礎。此批金陵書局所雕的版片在淪陷後，被偽軍劈作木材炊飯，可說是文化史上的一浩劫，後來中館籌備處也曾陸續收購了少許的明版及拓片，但微不足道。中館大量收購善本是在抗戰的中期，民國二十九年尾。那時上海文教界人士眼見淪陷區內藏書故家為生計所迫，將家藏珍籍流入上海市肆求售，建議政府亟予及時收購，否則必流散海外，將為國家文化莫大之損失。於是慰堂先生奉命化名道經香港潛往上海，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密商，委請主持收購善本事宜。其經費除動用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中館建築費的餘款外，教育部繼續撥款約兩百萬元。此次收購自三十年起至抗戰結束，一共收購了四、五萬冊，民國初年著名藏書家如吳興張氏、劉氏，金陵鄧氏，番禺沈氏所藏的精品，大都為中館購得。其中一部分於三十年曾運到香港，打算運往美國寄存，不幸珍珠港事變發生，為日軍攻香港時掠去，到勝利後才索回。

抗戰勝利後，教育部派先生為京滬區特派員，接收敵偽學校與文教機構。汪偽政府機構的藏書，除有主者發還外，普通本圖書分別撥交各大學圖書館，善本部分則收歸中央圖書館，其中較大宗的則是偽政府考試院長陳群的私人收藏。陳氏於聆悉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服毒自盡。他在南京、蘇州、上海均有藏書樓，收藏善本舊籍。他的南京澤存書庫由中館全部接收外，蘇州、上海所藏，僅擇善本運來南京，再加上復原後在南京陸續收購的善本，如中館鎮庫之寶南京書棚本《江湖群賢小集》、元代朱墨印本《金剛經》、以及若干敦煌卷子，陳篋齋的全形金文拓本都是這一期購獲。並以一部三朝本經書向國立蘭州圖書館交換到三十枚居延漢簡，那時中館藏書總量已達到了一百萬冊了。復員後，館中編目同仁，對於堆積如山的藏書，整理編目，真是目不暇給。其中的十二萬冊善本珍籍於民國三十七年底及民國三十八年分兩批運來臺灣，是日後臺灣出版事業蓬勃發展的源泉，也促成了臺灣文史研究的興起。

一所圖書館的發展，除了要有豐富的圖書集藏外，還必須有一座設備完善而宏偉的建築，才能盡量發揮它的功能，這是慰堂先生一直努力的目標，但終其任內未克達成，是所感到唯一遺憾的事。在南京籌備時期，先在沙塘園租用民房一幢辦公，後價購成賢街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的舊址，開始公開閱覽。業務漸上軌道後，即籌擬建館的計畫。首先獲得了朱驩先先生的支持，由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同意補助一百五十萬元的建館經費，又好不容易洽得天主教會同意由南京市政府擇地徵收，與之交換教會在國府路的一片寬廣的土地，即大倉園的舊址。有了建築經費與土地，於是組成建築委員會，請考試院戴季陶院長為主任委員，並公開徵建築圖樣，萬事俱備，只等審查決選圖樣公開招標。未料盧溝橋事變發生，此第一次建館計畫遂成泡影。

中館籌備處隨政府疏散到重慶，於民國二十九年結束籌備，正式成立，在重慶兩浮支路建造了一座合乎現代圖書館的建築，也是抗戰期中在戰時陪都最像樣的一棟建築，但格局較小，是慰堂先生用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的建築費中撥出了十七萬建造的，其餘的款項後來移用上海收購善本書了。

慰堂先生建造此館，並命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原打算備為還都後將此地作為分館之用，但後來勝利復員，教育部將此館改設國立羅斯福圖書館，以紀念美國羅斯福總統。

勝利復員後，慰堂先生本想完成原有建館計畫，但因政府實施憲政，將中央圖書館在國府路的預定建地上建造了一座國民大會堂，其餘空地做停車之用，於是慰堂先生只有在成賢街原址添建，以應付業務日增的需要。遷來臺灣後，於民國四十三年九月，教育部恢復中央圖書館的建制，徵召慰堂先生復館長原職，又燃起了建館的雄心。建館首要建地，他設法獲得省教育廳同意，將南海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辦公處所撥借給中央圖書館，因此很不獲何容、洪炎秋諸委員們的諒解。這個辦公處所本是日本的建功神社，房舍並不大，而且地居植物園內，屬禁建區。但前面廣闊，適宜建造一座能媲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建築，所以又申請內政部特准予建築許可。未料幾年後，前面寬闊的土地上為教育部調借用來先後建造了科學館、藝術館、及歷史博物館，甚至在中館之旁還建造了一座獻堂館，使中館只有跼蹐在重建功神社舊址一片土地上而無法施展，這時慰堂先生的心情是相當鬱悶的。民國四十七年的春天，慰堂先生陪胡適之先生來台中，晚上共餐時，向適之先生傾談，竟借酒澆愁大醉了一場。此後只有在此狹窄的土地上逐年添建、改建、擴充，不十年，終於湊成了一座雖尚不夠現代圖書館的格局，但也稱得上當年壯觀的建築。這十年的擴建，對慰堂先生來說，是歷盡艱辛的，因為政府的預算甚少，幾乎有一半是向海內外的基金會籌募得來的，有時建造中經費不繼，往往夜不能眠，繞室徬徨，籌思如何使不致停工。民國五十四年九月，行政院聘先生為故宮博物院院長；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先生辭去中館館長兼職，而專任故宮，終其任內，未能為中館建造一所合乎水準的館廈，在他是感到很遺憾的。民國六十七年，聽說教育部有決心完成中館的建築，由市政府撥給三千坪的建地，先生感到無限的欣喜。民國七十一年春，中央圖書館中山南路現

址舉行破土奠基典禮後，慰堂先生感到非常安慰，曾說：「成功何以在我。」不久後，他寫了一幅自輓聯交我收藏，其上聯云：「碌碌無能，一生只做一樁事，嘗盡甜酸苦辣」，即是指的建館而言。

一所圖書館的發展，除了豐富的集藏、宏偉的館廈外，人才也是重要的因素。慰堂先生很能因事而擇人，除了經常採編業務自文華圖書館專校遴選人才外，如在抗戰期中在上海收購善本時，聘徐森玉、鄭西諦兩位先生為編纂史籍考時，聘西南聯大尹石公教授來主持；又如抗戰勝利時，善本書及拓片大量增加，他從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將屈翼鵬先生請回來擔任特藏組主任，並將蘇景坡兄從敦煌藝術研究所請回來從事拓本的整理，且復原南京後，因出版英文的季刊而請錢鍾書來負責，都是因事擇人。他並不斷派員出國進修，以造就人才。目前曾在中館服務過而散在世界各地擔任大學圖書館長、東方部主任、或專任教授者大有人在，在在可看出慰堂先生對延攬及培植人才的重視，使得中館有多方面的發展。

中館是慰堂先生一手所創建並苦心扶植成長，故對中館的感情深厚。雖在他離開以後，仍時時以中館的發展縈懷於心，有機會則從旁協助，或迭有建言，故不免貽人辭煩之譏，但只要能瞭解他對中館的情懷，也就能曲諒了。（原載於《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四十七期，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一至四頁）

（本文原載於《蔣復璁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